



# 兒童權利公約： 兒童司法人權系譜

賴淳良

## 壹、前言

我國於 2014 年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將聯合國 1989 年兒童權利公約之內容轉為內國法律。因為我國不是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無法仿造兩人權公約之方式，使兒童權利公約取得條約的法源地位。然而由於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者，為兒童之基本權利事項，如果屬於憲法第 22 條所列之人權清單之內容，自可取得在國內法之地位，此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102 年釋字第 712 號解釋，推衍出家庭權之概念可為例證。因此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的兒童權利，如果屬於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其權利內容具有憲法的位階，應有優先適用的地位（註 1）。

兒童權利公約於第 37 條以下規定各種兒童司法人權，屬於我國憲法第 8 條所規定之法定正當程序及人身自由權以及第 16 條訴訟權之保障之範圍，也因此取得優先於法律適用的效力。因此有必要檢視我國少年司法制度，是否符合兒童權利公約

所保障之兒童司法人權內容。本文以少年事件審理程序為軸，動態的觀察不同程序階段所應注重的兒童司法人權，從移送法院之審前階段，審理、裁判，一直到處遇的階段，希望能從程序、動態的觀點理解少年司法人權系譜，而且以系譜分類的方式列出各階段的兒童司法人權。以兒童權利之多層保護原則為緯，使兒童權利叢可以在家庭、國家等兒童保護者之間流動分配，企盼切實保障兒童權利。

## 貳、兒童權利之多層保護原則

所謂兒童權利的多層保護原則，於兒童權利公約第 18 條有明文規定，可以從兩方面理解。其一是從責任主體的角度而言，係指保護兒童權利的主體，包含國家、社會和家庭（主要是父母），均應負起對兒童權利保護的責任。其中任何主體均在兒童權利的保護方面分別承擔其各自的責任。其二從責任的形態看，各種責任主體所承擔的責任內涵雖然可能時而有不同

之處，但是彼此之間是相互聯繫的，緊密相連，當家庭父母親無法照護兒童的責任時，必須由社會及國家接手。而當家庭父母親回復系統功能，復原照顧兒童的責任時，社會及國家也可能必須採取適當的措施，讓兒童回歸家庭的懷抱。又國家除了承擔補充性照護兒童責任之外，也必須對其他責任主體在兒童權利保護上的權利義務加以確定、規範與保護，社會、家庭也需要承擔保護兒童權利的責任，並承擔遵守國家所確立的在兒童權利保護方面的權利義務責任。因此照護兒童的責任形態是相互關聯的、緊密連接。

就父母責任而言，兒童權利公約第 18 條肯定了父母在兒童生存和發展中主要責任承擔者的角色，包含提供穩定的家庭環境、促進兒童生理及心理的健全發展、為兒童進行良好的教育、保護兒童免受各種剝削或者侵害的重大責任等。可以說兒童權利公約所規定的生存權、自由權、受益權，均有賴父母親的照護，方得落實。

當父母親負起照護兒童的責任時，依照兒童權利公約第 18 條第 2 項之規定，國家必須提供適當的協助，並應提供必要的機構、設施以及服務。此項國家責任之規定，應包含國家應設立學校讓父母得以落實兒童的教育發展權，也應該包含提供必要的親職教育服務，使父母得以認識並取得盡到父母責任必需的知識。除此之外，國家機關於發現並確認父母未能確實履踐對於兒童應盡之責任時，必須提供必要的協助。

兒童權利的多層保護原則，與兒童之人際網絡權正相呼應。人際網絡權要求國

家所設置的制度，機關做出的決定，必須以完善兒童的人際網絡為首要考量，包含形成兒童的人際網絡時必須考量新的人際網絡是否有利於確保兒童的生存權、自由權以及受益權、發展權等諸多權利。當變更兒童原有的人際網絡時，國家機關所設置的制度（感化教育）、做出的決定（收容），也應以在最少變動狀態下，以變動權利叢若干項目的方式，確保兒童得以在所熟悉的人際網絡中，過渡到必須變動的人際網絡中。因此國家機關不應使兒童處於劇烈變動的人際網絡中，而要求兒童陡然斷絕與父親或母親一方之人際網絡。此正是呼應兒童是權利的主體，兒童人際網絡權的具象要求。

## 參、移送法院前之少年司法人權

兒童有觸犯刑事法令或者失序行為，尚未移送法院進入本案調查審理程序之前，可能有警員的逮捕、乃至於移送法院裁定收容等程序。在這個階段，有以下幾項兒童司法人權應受保障：

### 一、人身自由權

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 (b) 款首先規定，不得非法或恣意剝奪任何兒童自由的基本原則，揭示確保兒童的人身自由權。該款後段進一步揭示人身自由剝奪之「法律保留原則」以及「最後手段原則」。換言之，對於兒童人身自由的剝奪，必須有法律的依據，僅僅只有行政規則或行政命令，均不足成為剝奪兒童人身自由的依據。以我國而言，目前有少年事件處理法

分別於第 23 條規定同行（逮捕）少年的要件，第 26 條第 2 款規定收容之要件。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曾經於 2009 年做出釋字第 664 號解釋，闡述少年事件處理法收容要件，認為該條規定限於「不能責付或責付顯不適當者」才能收容，已經揭示了收容的最後手段，至於最後手段性的判斷，大法官會議也在理由中闡述，必須先考慮有無其他適當的福利或教養機構可供選擇，而且必須在「調查審理得以進行的必要範圍內」方得收容。因此，設置適當的福利或教養機構，以貫徹兒童人身自由剝奪的最後手段性，也成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的重要舉措。

兒童人身自由被剝奪後，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 (c) 款更揭示執行剝奪人身自由時必須遵守的幾項原則（註 2），分別是人道待遇原則、個別化原則、分類分界原則以及確保維繫人際網絡權等。換言之，收容兒童時，必須依照其年齡之需要對待之，而且必須與成年人隔離分界。又為了使兒童早日復歸家庭社會，兒童在收容中，也應確保與家人保持聯繫，並能通訊以及與家人探視會面的人際網絡維繫權。

人身自由被剝奪後，應賦予兒童有救濟的權利，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 (d) 款後段明文規定之。此項規定，有三點重要內容，第一項是可以要求審查剝奪自由的合法性，第二項是該審查必須由獨立公正的機關為之，第三項是審查的決定必須迅速。其中剝奪自由決定的合法性，如前述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64 條解釋，對逃學逃家少年收容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最終並做出違反憲法的決定。所謂獨立公正

機關，依照我國憲法第 8 條所揭示法定正當程序、法官保留原則等，剝奪自由的審查最終必須由法官為之。至於審查決定之迅速性，旨在貫徹保障兒童受迅速審判的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聯合國保護被剝奪自由少年規則第 11 條 (b) 款之規定「剝奪自由係指對一個人採取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監禁，或將其安置於另一公私拘禁處所，由於任何司法、行政或其他公共當局的命令而不准其自行離去」。並不限於因為觸犯刑事法令而遭到拘禁的情形，即使是基於精神復康療程、管教改造、難民管理等理由，而剝奪人身自由者，均應適用上述規定（註 3）。

## 二、受告知權

兒童被逮捕時，防衛並答辯自己權益的起點在於兒童究竟有做了哪些觸犯刑事法令的行為，而這些事情只有逮捕的警員最清楚，因此要求警員於逮捕之初，即必須告知兒童所觸犯的刑事法令及罪名，即為保障兒童權利的重要之舉。兒童權利公約於第 40 條第 2 項 (b) 款前段即規定「對其被控訴的罪名能夠迅速且直接告知」，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之 1 也有明文規定。更且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 (b) 款 (ii) 目鑑於兒童可能不知刑事程序之真實意義及後果，因此規定得由父母親或法定監護人告知。

至於告知事項之範圍，兒童權利公約之中文文字為「罪名」，英文原文為「charges」，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之 1 則規定為「犯罪事實或虞犯事由」，

我國法律的規定顯然較為完整而接近兒童權利公約英文原文。另外，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還規定必須告知得選任律師充任輔佐人，對於告知事項之範圍更為周全。

### 三、聽審請求權

兒童被指控有觸犯刑事法令的行為時，應有權利陳述事實以及自己的意見，此即為聽審請求權（註4）。聽審請求權為刑事被告重要的基本人權，兒童也不例外。不過，兒童陳述意見的能力通常不足，因此必須強化其陳述能力，而有進而保障其受到協助陳述的權利。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了兒童陳述意見以及意願受尊重的權利，更進而在第37條第(d)款規定「兒童…有迅速獲得法律及其他適當協助的權利」、第40條第2項第(b)款(ii)目規定「…於準備與提出答辯時並獲得法律或其他適當的協助」。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1條保障少年隨時有律師協助的權利。對於重罪，規定必須為兒童選任律師。在法律制度上，可以說已經相當完善地保障兒童的聽審請求權。而實務運作上，有必要更強化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1條之2所規定「輔佐人除保障少年於程序上之權利外，應協助少年法院促成少年之健全成長。」之意涵。

聽審請求權之保障以能了解警員等訊問者之語言為必要，因此兒童權利公約第40條第2項第(b)款(vi)目規定訊問者使用兒童不了解的或不會說的語言時，應提供免費之通譯。此於我國屬於有待持續努力的事項。

### 四、隱私權

少年刑事司法的目的，一如兒童權利公約第40條所載「依兒童之年齡與對其重返社會，並在社會承擔建設性角色之期待下，促進兒童之尊嚴及價值感，以增強對其他人之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因此，避免兒童被標籤化，成為少年刑事司法所不可忽略的重要環節。兒童權利公約於第16條首先規定兒童隱私權之保障，進而於第40條第2項(b)款(vii)目規定兒童在刑事程序中，應充分尊重兒童之隱私。此所謂刑事程序，包含警員初次接觸非行少年開始（註5）。

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也明確規定「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兒童及少年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者，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也在法制層面上，相當完善地保障非行少年的隱私權。

### 肆、調查以及審理中少年司法人權

少年保護事件或刑事案件調查審理中，除了所述之受告知權、聽審請求權、隱私權之外，兒童權利公約還揭示了以下應保障的兒童司法人權。



## 一、公正程序請求權

公正程序請求權係指兒童有權利請求國家選任受身分保障的合格法官，在確保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其他干擾下，審理案件的權利。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 (b) 款 (iii) 目明定此項權利「要求有權、獨立且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審理」。此與我國憲法第 80 條規定法官審判獨立原則以及第 81 條規定法官身分保障，意旨相同。我國並且有法官法、法院組織法、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等各項法律確保此項請求權。

兒童權利公約除了規定公正程序之外，還於第 40 條第 3 項規定「應特別設置適用的法律、程序、機關與機構」。我國也訂有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法院組織法等法律，規定了少年事件的特別處理程序以及特定的機構。法官的選任有特別的專業資格以及訓練（註 6）。

## 二、迅速審判請求權

所謂迅速審判請求權係指兒童有權利要求案件之審理在適當的情形下，從速進行。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 (b) 款 (iii) 目明定此項權利，規定「要求有權、獨立且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迅速依法…審理」。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1998 年釋字第 446 號解釋也闡述「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明定。所稱訴訟權，乃人民在司法上之受益權，不僅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得提起訴訟請求權利保護，尤應保障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迅速審判，獲得救濟之權利，俾使人民不受法律以外之成文或不成文例規

之不當限制，以確保其訴訟主體地位。」

## 三、父母在場陪同權

兒童對於司法程序的理解比較薄弱，面對不熟悉之場域，程序過程期間所可能帶來的驚慌以及恐懼，可能都不利於兒童重返社會。因此有熟悉的父母親或親人陪同，確實有必要，也是保障兒童陳述意見權的重要方法。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 (b) 款 (iii) 目規定了此項權利，並規定只有在不符合兒童最佳利益時，才可以排除兒童此項權利，例如兒童施用毒品甚或販賣毒品，來自於父母親之供給等等。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1 條規定「少年法院法官或少年調查官對於事件之調查，必要時得傳喚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到場。」只限於必要時，而且只規定「法官或少年調查官之事件調查」時，方傳喚少年之法定代理人等人到場，與兒童權利公約之父母在場陪同權，並未完全相符。雖然司法實務上，大多通知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到場，但在法制上仍有可以改進的空間。

由於父母在場陪同權是兒童的權利，並不是父母權利的行使，因此於父母親離異的情形，並不是只有承擔親子責任之一方才有權利到場。另外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也列入可以由「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在場，只要是長期性、繼續性照顧兒童之人，例如祖父母，均可陪同在場（註 7）。

兒童希望父母在場陪同，但是父母卻因為主觀的因素或客觀經濟因素，無法在場陪同，此於臺灣偏鄉經濟發展不佳、交通不良的地區，特別容易發生。少年事件

處理法第 31 條雖然規定可以由法院選任律師為輔佐人，然而律師之主要功能是在確保兒童之聽審請求權，因此在場陪同的人應該可以有廣泛的選擇性，包含其他專業人士，例如社工、心理師等等。我國家事事件法第 15 條以下的程序監理人制度以及美國各州處理少年事件之家事法庭中的保護人制度 (guardian ad litem) (註 8) 也有參考採納的價值。

#### 四、證人詰問權

證人往往是認定兒童非行事實之重要證據，而詰問證人被認為是確保證人陳述真實性的有效方法以及當事人程序參與權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司法程序中，也應保障兒童有詰問證人的權利。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 (b) 款 (iv) 目也規定「…兒童…可詰問或間接詰問對自身不利之證人，並且在平等之條件下，要求對自己有利的證人出庭並接受詰問」。我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會議也於 2004 年做出釋字第 582 號解釋闡述詰問屬於人民訴訟權之重要內涵。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於第 24 條明文準用刑事訴訟法有關證人之規定，在法制層面上保障了兒童的證人詰問權。

#### 五、審理不公開原則

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 (b) 款 (vii) 規定了兒童隱私權之保障，詳如前述，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建議少年事件之審理應以非公開方式為之 (註 9)。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4 條規定少年保護事件之審理採取不公開審理原則，

例外地僅允許「少年之親屬、學校教師、從事少年保護事業之人或其他認為相當之人在場旁聽。」。至於少年刑事案件之審理，則於第 73 條第 1 項規定「得不公開之」。但因為同條第 3 項規定「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請求公開審判者，除有法定不得公開之原因外，法院不得拒絕。」似乎採取以公開審判為原則的立法主義，是否與兒童權利公約之內容相符，容有討論之處。而且第 3 項所規定可請求公開審判者，只要是少年法定代理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即可，縱使少年本人不願意公開，法官仍不得拒絕公開審判，似乎也與兒童作為程序主體之基本理念不完全一致。

### 伍、裁判中少年司法人權

#### 一、處遇法定原則

兒童是否有觸犯刑事法令之行為，或者有非法行為應接受特定處遇，應由法律規定之，而不得由行政命令為之，此即處遇法定原則，也是我國憲法第 23 條所規定法律保留原則的一環。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 (a) 款即明文規定之。在此原則上，更衍生出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亦即認定兒童有觸犯刑事法令或是失序行為，而必須接受刑罰或者其他處遇時，其構成要件必須明確。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第 1 款就兒童是否觸犯刑事法令行為，由於必須依照刑法以及其他特別刑法判斷之，固無疑問。但是同條第 2 款各項所謂虞犯行為，是否符合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則有爭

議。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 2009 年做出釋字第 664 號解釋，認為「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常逃學或逃家之少年，…尚難逕認其為違憲；惟該規定仍有涵蓋過廣與不明確之嫌，應儘速檢討改進。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就限制經常逃學或逃家虞犯少年人身自由部分，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亦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少年人格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個月時，失其效力。」

兒童逃學、逃家、深夜在外遊蕩等等失序行為，是否應接受適當處遇，有學者從虞犯制度之存廢著眼，肯定虞犯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註 10）。也有學者認為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僅是宣示這些少年的唯一歸處就是充滿了犯罪吸引力的社會大染缸（註 11）。也有法官認為虞犯行為並不是犯罪行為，不應適用刑事程序，而應由教育少年的目的，改從民事程序法理，並由家事法庭處理之（註 12）。

類似的爭論，也一直存在於美國少年司法制度上。美國法上，原本將觸犯刑罰行為之少年稱為觸法 (Delinquency) 少年，將違反社會規範而沒有觸犯刑罰行為之少年，稱之為「虞犯少年」(wayward minors)。之後於 1960 年代起，思想潮流認為應該把虞犯少年從觸法少年的處遇體系中獨立出來，另外建構一個完整的保護體系，隨後即改稱為「失序少年」(status offender)。1976 年美國聯邦全國刑事司法政策目標及最低標準建議委員會，曾經提出一項失序少年的處遇建議，基本的目

標是「只有自我毀害傾向或其他有害少年之行為出現時，才由家事法庭介入。」，具體的標準是只有五種類型的行為才被認定是少年法庭應處理的失序行為，分別是經常性曠課、一再地侵犯父母權威、一再逃家、一再飲用成癮性酒類飲料、10 歲以下兒童的觸法行為。著名的團體如美國律師協會也加入倡議的行列，該協會建議將失序少年完全排除在少年法庭的管轄範圍外，並於 2006 年提出少年司法的改革呼籲。隨後，康乃狄克州重組了少年司法組織，將 16 歲以下的失序少年轉交給名為「家庭及兒童福利署」(Department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處理。透過連結社區資源以及處遇，整合公私社會、教育、法院資源，為有困擾的少年以及家庭提供個人、群體以及家庭的治療。在新制度下，失序少年不再被收容。不過法院仍扮演一定的權威角色，法院可以透過裁定的方式要求失序少年遵守裁定的內容，當失序少年不遵守法院裁定時，即轉成為犯有藐視法庭罪的觸法行為，法院也因此可以裁定收容。紐約州也採取審前處遇制度，要求失序少年在移送家事法庭之前，必須先為失序少年及家庭提供介入及轉向服務。當介入及轉向服務沒有效果之後，才能由社會福利機關或者是少年司法人員提供其他必要的再犯預防措施，包含法院的介入。其他州也紛紛修改法律，明確化失序少年的範圍。

不過，少年司法改革的運動，並沒有獲得美國多數少年法庭法官的支持，法官們總認為失去法院權威的及早介入，失序少年很可能會犯下更嚴重的犯罪。而統計

也的確顯示，逃學逃家流浪街頭的少年，多半有嚴重的情緒困擾，也會犯下許多自我摧殘的行為，包含自殘甚至自盡等（註 13）。

美國的經驗是否可以供作我國變革少年司法制度的參考，還有兩項因素必須納入。第一項是美國，少年事件的審理，有些州交給刑事法院審理，有些州交給監護法院 (probate court)，而大多數的州都是交給家事法院或者是獨立的少年法院審理。美國的監護法院主要是處理遺囑、遺產管理、未成年人保護以及監護宣告的案件，因此也將觸法少年案件的審理納入其中。而家事法院的管轄權限更廣，包含所有的家事事件、個人身分事件、親子責任事件、未成年人扶養事件等等。由家事法院審理少年事件的優點，在於法院人員能夠更專責地處理所有涉及少年的相關事件，且更容易獲得包含立法在內的資源（註 14）。另外一項要素是美國有藐視法庭罪，兒童不遵守法院所發布之命令，例如留置在特定安置機構中，就是觸犯刑事法令罪的行為。

## 二、無罪推定原則

無罪推定原則可以說是刑事程序的基本原則，此於少年保護事件、少年刑事案件均應一體適用。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 (b) 款 (i) 目也明確規定了此項原則。

## 三、保護優先原則

所謂保護優先原則，係指非行兒童之處遇，應優先採取保護處分的方式，只有在保護處分不適合兒童時，才採取刑事處分（註 15）。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3

項 (b) 款規定「於適當及必要時，制定不對此等兒童訴諸司法程序之措施」。所謂保護處分主要是採取非機構式處遇，讓兒童繼續留在社區或家庭中，與家庭維持一定之聯繫關係，避免從社區中脫離而出。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也一直秉持此項基本原則，第 27 條規定少年法庭先議原則，規定非行少年必須先由少年法庭調查後，才能由少年法庭決定是否送刑事審判程序。另外於第 29 條以及第 42 條分別規定各種可供法官選擇之保護處分。

## 四、處遇個別化原則

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4 項規定「為確保兒童福祉，並合乎其自身狀況與違法情事，應採行…處置…」。亦即對於非行少年的處遇，不能僅以違法情節判斷之，必須依照個別兒童自身的狀況決定之。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9 條為了確保此項原則，規定必須由少年調查官先調查該少年與事件有關之行為、其人之品格、經歷、身心狀況、家庭情形、社會環境、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必要之事項，提出報告，並附具建議。

## 五、處遇多樣化原則

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4 項規定「…應採行多樣化處置，例如照顧、輔導或監督裁定、諮商輔導、觀護、寄養照顧、教育或職業培訓方案及其他替代機構照顧之方式。」。使法院可以根據非行兒童之個別自身及家庭狀況採取最適合的處遇方式。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區分保護事件與刑事案件，後者轉而適用刑罰手段，前者



於該法第 29 條以及第 42 條採取多樣化保護處分處遇方式。有

- (1) 不付審理
- (2) 不付審理外加轉介輔導、教家長嚴加管教、告誡
- (3) 不付審理加道歉、書寫悔過書、賠償
- (4) 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
- (5) 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
- (6) 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輔導。
- (7) 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
- (8) 少年染有煙毒或吸用麻醉、迷幻物品成癮，或有酗酒習慣者，令入相當處所實施禁戒。
- (9) 少年身體或精神狀態顯有缺陷者，令入相當處所實施治療

我國處遇方式雖然種類繁多，甚至於第 84 條還規定了少年之父母親接受親職教育輔導。然而仍缺乏諸如諮商輔導、寄養照顧、職業培訓等處遇方式，只能在審理中由法官搭配少年調查官，或者於執行中，法官搭配少年保護官，基於熱情推動之。而且由於我國少年法庭與家事法庭分立，分別不同的程序處理，迄今無法將非行少年的家庭狀況，例如父母親缺位等狀況一併處理，仍有改進的空間。

## 六、兒童意願受尊重權

兒童權利公約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有表示現意見能力的兒童得就涉及本身之事項陳述意見，且應依照兒童的年齡以及成熟度，衡酌意見的重要度。」，此即兒童意願受尊重的權利（註

16）。

少年刑事司法程序中，是否有兒童意願受尊重權利，容有不同見解之餘地，然而意願受尊重並不意味著法官的決定必須遵從兒童的意願，而只是應依照兒童的年齡以及成熟度，衡酌意見的重要度，作為決定之重要參考。意願受尊重的權利正可以彰顯兒童作為權利主體，作為刑事程序主體地位，應有承認之必要。並且可與前述聽審請求權結合，而使兒童有充分之機會參與程序之決定。

我國少年司法實務運作，經由少年保護事件審理細則第 19 條以及第 40 條第 2 項之規定，發展出協商式審理模式（註 17），允許法官、少年調查官以及少年、少年法定代理人共同協商最佳的處遇方式，雖然有學者批評協商式審理的不當擴張（註 18）。不過，本文認為協商式審理確實成為少年表達意願的重要法制管道（註 19）。

## 七、裁判書不公開原則

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 (b) 款 (vii) 保障了兒童隱私權，自應貫徹到裁判書的公布上。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因此規定「任何人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或照片，使閱者由該項資料足以知悉其人為該保護事件受調查、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件之被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9 條第 2 項也同樣規定「…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三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

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司法實務上也將少年裁判書列為不公開的文書。

## 八、禁止死刑及無期徒刑原則

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 (a) 款規定「對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犯罪行，不得處以死刑或無釋放可能之無期徒刑。」。我國刑法第 63 條已經明文規定未滿十八歲之人，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 九、救濟權

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 (b) 款 (v) 目規定了救濟程序，凡是因為觸犯刑事法令之行為而生之處遇，兒童均可以請求由較高層級之權責、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再為審查，此即救濟權的保障。我國少年保護事件有抗告程序，少年刑事案件則有上訴程序，相當程度保障兒童的救濟權。

## 陸、處遇中之少年司法人權

非行兒童經裁定為保護處分或者處刑罰，特別是無法自由離去特定處所之處遇時，兒童權利公約仍要求保障其權利。被剝奪自由少年之權利保障，1990 年聯合國保護被剝奪自由少年規則有詳細的規定，以下介紹與兒童權利公約相應之部分。

### 一、健康照護

兒童權利公約第 24 條規定了對兒童的健康照護基準，包含疾病消除、提供營養食物、清潔飲水、防止意外事故等等。這些健康照護的基準也同樣適用於被安置

或被監禁的非行少年。而聯合國保護被剝奪自由少年規則更是詳細規定少年設施管理、分類安置、物質環境以及住宿條件、娛樂、宗教、醫療管理、疾病通知、管理人員應盡之職責等等，均應作為我國改善少年處遇機構之指標。

## 二、教育及其他適當協助

由於少年司法的目的，在於協助非行少年重返社會，因此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 (d) 款規定，被剝奪自由的兒童，以迅速獲得適當協助的權利。而且第 40 條第 4 項也規定處置方式中，應包含教育或職業培訓方案。因此在少年處遇之方法上，也應納入教育及職業培訓的方案。

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規定之處遇方式，剝奪少年自由的處遇，有感化教育以及有期徒刑等刑事處罰。感化教育由法務部所設置之輔育院執行，有期徒刑則由少年監獄執行。惟自從 1997 年制訂「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後，即積極轉型朝向教育機構發展，因此新竹少年監獄改制為專門收容感化教育的少年，更名為誠正中學。高雄少年輔育院則改為明陽中學，專門收納少年受刑人。雖然已經啟動朝向教育型機構發展的道路，不過由於主管機關仍為主管監所系統的法務部，而不是主管教育的教育部，因此學者對於改革的進度多有鞭策之議（註 20）。值此兒童權利公約成為我國法之際，少年處遇機構也有必要做出相應調整與變革。

## 三、父母及親人之探視

兒童與成年人不同，通常欠缺完全

的自我照顧的能力，無法以適當的方法取得維生的資源，也可能無法有效面對驟然改變的生活環境，必須仰賴其他成年人。最能給予兒童充分照顧的成年人，應該設定為生物上的父母親，然後還可以仰賴祖父母、伯叔姑姨、兄弟姊妹等親屬，再若不然，可以仰賴善心人士或國家機關的介入。因此保護兒童的核心任務，在於為兒童建立一套緊密有效且可以充分發揮照顧兒童成長的人際網絡，此即兒童的人際網絡權（relationship rights of children）。兒童得成為權利主體的命題，為兒童權利公約之基本理念，對於兒童權利的瞭解，應從權利之利益理論（interest theory）著手，而非從權利之意志理論（will theory）出發，蓋對於兒童而言，權利的意涵更多在於保障其利益，而非其意志（註 21）。

當國家憑藉公權力變動了兒童原有的人際網絡時，仍應只在必要的範圍內對兒童原有的人際網絡重新作出安排，而不應貿然地斷絕原有的人際網絡關係。因此，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 (c) 款最後一句規定，兒童有權透過通訊及探視與家人保持聯繫。

我國少年輔育院條例第 44 條以及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 73 條規定學生接見親友以及通信的限制，是否能符合兒童權利公約的內容，容有檢討之必要。

#### 四、救濟權

兒童受剝奪自由的處遇決定之後，仍應賦予就處遇事項異議的權利。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 (d) 款規定之意旨即在於闡述

此項異議的權利（註 22），與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所規定之異議對象並不相同。

我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 2017 年做出釋字第 755 號解釋，肯定監獄受刑人對於監獄管理處分之異議權，於被剝奪自由之兒童亦應同等適用。該號大法官會議解釋認為「監獄行刑法第 6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條第 7 款之規定，不許受刑人就監獄處分或其他管理措施，逾越達成監獄行刑目的所必要之範圍，而不法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且非顯屬輕微時，得向法院請求救濟之部分，逾越憲法第 23 條之必要程度，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遲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監獄行刑法及相關法規，就受刑人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訂定適當之規範。」

#### 柒、結語

兒童權利公約宣示兒童作為權利主體的地位，兒童在少年刑事司法程序中也應該被作為程序主體，而在每一個刑事程序階段，從移送法院之前的訊問、調查審理、處遇等，均有應受保障的兒童權利。其中我國目前最為重要莫過於聽審請求權、意願受尊重權以及在處遇階段的各項權利的保障。兒童權利的宣稱不同於自由權利模式，而更像是一種網絡模式。在網絡模式中則更聚焦於每一個人，強調每一個人與他人之間網絡的纖維強弱，更注重傾聽人的心聲、去除疏離感、非階層式的言說討論（deliberation）以及盡量避免二元對立的

結果決定（註 23）。並且希望在多重保護的原則下，讓兒童可以做為主體與其他社會成員共同經營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我國少年司法制度之運作，雖然已經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就如何從少年人際網絡中，在審理程序以及執行程序中保障聽審請求權、陳述意見權以及意願受尊重權，仍有

可以繼續努力的空間。

（本文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華嚴法律事務所律師）

**關鍵詞：**兒童權利公約、少年司法人權

## 註 釋

註 1：賴淳良(2015)，〈兒童權利公約於我國家事事件審理之意義與實踐〉，104 年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研究報告，頁 9-14。

註 2：高玉泉(2016)，《兒童權利公約逐條要義》，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台北，頁 344。

註 3：王勇民(2010)，《兒童權利保護的國際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頁 216。

註 4：林鈺雄(2006)，《刑事訴訟法》(上冊)，台北，頁 152。

註 5：高玉泉(2016)，《兒童權利公約逐條要義》，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台北，頁 379-380。

註 6：李茂生(2018)，《少年事件處理法論文集》，台北，新學林，頁 300 以下。

註 7：謝瑞龍(2017)，〈少年保護事件調查審理與執行之實務研究〉，司法院印行，頁 148。

註 8：Larry J Siegel & Brandon C. Welsh,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ory, Practice and Law*, 13th.ed., Cengage Learning, 2018, p.557.

註 9：高玉泉(2016)，頁 380。

註 10：李芳南(2010)，〈少年虞犯相關問題研究〉，司法研究年報第 27 輯。

註 11：李茂生(2018)，頁 317。

註 12：黃義成(2013)，〈少年虞犯法理的省思與建構〉，《台大法學論叢》，第 42 卷第 3 期。

註 13：CRPD/C/URY/CO.Larry J Siegel & Brandon C. Welsh,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ory, Practice and Law*, 13th.ed., Cengage Learning, 2018, pp31-.32.

註 14：Larry J Siegel & Brandon C. Welsh, *supra* note, pp.556.

註 15：蔡惠芳(2002)，〈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在我國少年司法制度之落實〉，《律師雜誌》，第 278 期，頁，頁 37。

註 16：高玉泉(2016)，頁 93。



註 17：謝瑞龍 (2017)，頁 190 以下。

註 18：李茂生 (2018)，頁 342 以下。

註 19：高玉泉 (2016)，頁 375。也強調兒童意願受尊重權於少年司法中也同樣適用。

註 20：李茂生 (2018)，頁 291 以下。謝瑞龍 (2017)，頁 271 以下。

註 21：James G. Dwyer, A Taxonomy of Children' s Existing Rights in States Decision Making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11 Wm.& Mary Bill Rts.J. 845(2003)，Fn.3.

註 22：高玉泉 (2016)，頁 344。

註 23：Ruth Zafran, Children' s Rights as Relational Rights: the Case of Relocation, 18 Am. U.J. Gender Soc. Pol' y & L. 163(2010), p.193.

## 參考文獻

王勇民 (2010)，《兒童權利保護的國際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李茂生 (2018)，《少年事件處理法論文集》，台北，新學林

李芳南 (2010)，〈少年虞犯相關問題研究〉，司法研究年報第 27 輯。

林鈺雄 (2006)，《刑事訴訟法》( 上冊 )，台北，

高玉泉 (2016)，《兒童權利公約逐條要義》，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台北

蔡惠芳 (2002)，〈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在我國少年司法制度之落實〉，《律師雜誌》，第 278 期

賴淳良 (2015)，〈兒童權利公約於我國家事事件審理之意義與實踐〉，104 年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研究報告。

謝瑞龍 (2017)，〈少年保護事件調查審理與執行之實務研究〉，司法院印行

Larry J Siegel & Brandon C. Welsh,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ory, Practice and Law, 13th. ed. ,Cengage Learning,2018.

James G. Dwyer, A Taxonomy of Children' s Existing Rights in States Decision Making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Wm.& Mary Bill Rts.J. 845(2003) 11

Ruth Zafran, Children' s Rights as Relational Rights: the Case of Relocation, 18 Am. U.J. Gender Soc. Pol' y & L. 163(2010).